

道德哲學、道德強度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聯性探討

洪雪卿* 黃奕誠**

摘要：本研究以大學商管相關科系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商業模擬情境，以道德決策流程理論與議題權變模型為基礎架構，從道德哲學與道德強度觀點，探討影響大學生道德決策的相關因素。本研究收回 1,082 份有效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當個人愈能知覺到道德問題時，則較能產生道德判斷，進而具有較高的道德意圖，道德強度與道德決策流程有關。其次，偏向理想主義之學生面對道德困境時，其道德強度愈會中介影響其道德決策流程；而偏向相對主義者面對道德決策時，道德強度之中介影響則較不顯著。此外，財金系學生之相對主義程度顯著高於會計、企管兩系之學生。

關鍵詞：道德決策流程、道德強度、道德哲學

*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碩士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rsonal Moral Philosophy, Perceived Moral Intensity,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heue-Ching Hong* Yi-Cheng Huang**

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of students from colleges of business/management, this study uses business simulation scenarios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determinant factors affecting students' making ethical-decisions, based on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ory and issue-contingent model, from moral philosophy and ethical issues (moral intensity) perspectives. Valid samples totaling 1,082 were collected to undertake analysis.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more one's perception of moral issues, the more likely he or she passes on moral judgment, thus further leading to higher moral intent. Moral intensity and ethical-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In addition, when facing an ethical dilemma,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Idealism-prone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mediated by moral intensity, whereas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Relativism-prone students are less significantly mediated by moral intensity. Finally, students majoring finance have significant higher relativism tendency than those majoring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Keywords: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oral intensity, moral philosoph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Tamkang University

** Master,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Tamkang University

壹、緒論

經濟的蓬勃發展連帶產生許多層出不窮的企業舞弊事件，從雷曼兄弟、安隆（Enron）案和我國的博達、力霸案中，可知不少企業利用操縱財務報表達到美化企業體質的目的。辦案人員表示：「力霸集團掏空弊案，很像美國安隆風暴，都是典型的集體舞弊掏空案；財會主管早就知道財務黑洞，但卻為了既得利益，願意替公司決策者掩飾財務危機，導致最後一發不可收拾」¹。從上述得知，企業財務報導之舞弊，並非會計專業人員一意孤行，而是由管理階層所主導。深究各種財務弊案的起源係不脫「人」的因素，而「道德」似乎是杜絕所有弊端發生的解決之道，因此，近年道德領域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

Rest (1986) 建立的道德決策模型包括了四個連續的步驟（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道德意圖及道德行為），而此模型普遍使用於檢測情境和組織對個人影響之研究中（Wright, Cullinan, and Blin, 1997; Douglas, Davidson, and Schwartz, 2001）。然而，上述之道德決策模型並未考量個人所身處道德困境之外在因素（Jones, 1991）。因此有學者提出，評估道德困境本身對道德決策流程之影響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但至今卻鮮少受到關注（Leitsch, 2004）。Jones (1991) 的理論即是強調道德困境之特徵（道德強度）會顯著影響道德決策流程。例如：Leitsch (2006) 指出，比起偷一大筆錢，在工作場所中偷一枝筆或一張紙較不容易讓人感覺不道德。Jones (1991) 認為道德強度是對道德困境本身特徵客觀的描述，並未包括道德決策者本身的特徵。而方妙玲 (2008) 卻認為個人會針對倫理議題的客觀事實做出主觀的認知感受，其強調個人本身的主觀認知，也就是說，道德決策者會主觀的影響其對道德議題之認知。基於以上所述，道德決策者往往會依據個人道德原則的道德哲學來辨識困境本身之道德強度，進而影響其道德決策流程。而國內目前此關聯性之相關研究稀少，因此期望利用此研究模型檢測大學生之道德決策流程。Fishbein and Ajzen (1975) 認為「可以從一個人的行為意圖預測其行為」，然而由於實際行為衡量困難，所以較少學者測試這個階段（Jones, Massey, and Thorne, 2003），故本研究之道德決策流程排除實際道德行為之檢測。

道德之培養是人格成長的主要成分，Rest (1993) 發現教育和年紀是道德發展中重要的決定因素。學生於求學階段其道德發展逐漸養成，因此可以知道教育的重要性。故學校對於專業人才的養成，除專業知識的傳授外，職業道德觀念的灌輸亦值得正視與探討。我國大學在人才培育的訓練上一向偏重理論和技術，很少重視職業道德的教育，因此許多大學畢業生投入職場後，追求的是更有績效、利益極大化的方式來完成工作，過程中往往忽略了對職業道德的考量及社會道德的省思，因此形成了一種奇特現象，教育程度愈高、專業知識愈強之專業人士，其職業道德卻愈薄

¹ 聯合報，2007/02/06 A4 版，「力霸案典型集體舞弊掏空」。

弱。大學教育是孕育專業人才的搖籃，因此對於道德教育亦應多所著墨，將職業道德內化於學子身上。爰此，更讓人亟思大學生在學校期間對於道德觀念養成之課題。由前述企業舞弊案件中可以得知，管理階層為圖利自己未能盡代理之責，反而進行操縱企業盈餘，危害股東權利，造成其利益與企業對立，產生所謂的管理階層之「道德危機」²。華爾街金融專業人士，因為慾望之貪婪而不當操作金融商品，導致 2008 年金融風暴，進而使全球景氣蕭條。因此金融從業人員之道德觀日趨受到世人關注。所以，受到商管教育專業訓練之大學生們（例如：企管、會計及財金學系之學生），日後進入商管領域可能性頗高，因此其道德決策值得深入探討。目前我國大學會計系將職業道德規範安排於審計課程中教授，而審計課程大部分學校皆安排為高年級之必修課程。而相較於會計領域，在企業管理及財務金融方面，則未有道德相關之明文準則規範依循，且 Shaub (1994) 主張會計課程能夠加強對於學生的道德感。

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道德哲學（理想主義與相對主義）、道德強度（潛在損害與社會壓力）與個人的道德決策流程之關聯性；驗證道德強度是否為中介變數；以及檢測學生之道德哲學是否會因系別、年級和性別而有所差異。期許本研究結果能對教育者和雇主提供重要、實質的意涵，藉此在學校教育和員工訓練課程的設計上，增加個人道德哲學及道德強度之考量，並依據分析結果希冀為道德相關的學術領域注入更多元的見解與論述。

本研究運用 Rest (1986) 的道德決策流程理論與 Jones (1991) 議題權變模型為基礎架構，以北部三所大學（兩所國立學校、一所私立學校）中之會計系、企管系及財金系二年級和四年級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為 1,082 份。實證結果顯示，當學生愈能知覺到道德問題時，則較能產生道德判斷，進而具有較高的道德意圖，然而認知道德問題並未顯著影響道德意圖。瞭解道德決策各階段間之正向關係後，教育單位可以針對道德議題本身來擬定因應對策，提高學生之道德認知，進而產生符合道德規範之行為。本研究發現道德強度會顯著影響學生整體道德決策流程；其次，道德哲學若偏向理想主義者，對於道德強度皆呈現顯著正相關，而道德哲學若偏向相對主義者除「操縱公司盈餘」情境以外，會與潛在損害呈現顯著負相關，而與社會壓力關係不顯著；本研究結果顯示，較偏向理想主義之學生道德強度皆產生中介之影響。而偏向相對主義者，潛在損害僅於「信用政策」情境的道德判斷及意圖，產生中介效果。最後，財金系學生其相對主義色彩顯著高於其他兩系之學生（會計、企管）、年級則不論在理想或是相對主義上皆沒有顯著差異、以及女性較男性偏向理想主義。

以往研究以探討道德強度對道德決策流程影響為主 (Nisbett and Ross, 1980; Singhapakdi, Vitell, and Kraft, 1996; May and Pauli, 2002; Barnett and Valentine, 2004;

² 道德危機 (Moral Hazard) 為代理理論中之一部分，其意涵為代理人為其利益因而犧牲委託人權益，違反代理人於其職位應盡之責任與義務。

Sweeney and Costello, 2009)。此外，周逸衡、凌儀玲與巫喜瑞（2000）之研究重點主要是發展一份適合檢測行銷道德強度之虛擬情境劇本作為問卷調查工具，並探討道德強度高低以及個人道德哲學對行銷人員道德決策水準的相關性。將道德強度做為道德哲學及道德決策流程之中介變數進行探討之研究甚為稀少。本研究將道德哲學加入 Rest (1986) 與 Jones (1991) 的道德理論基礎架構中。本研究認為，個人主觀的道德哲學會認知客觀道德議題（道德強度），進而形成道德決策；且認為道德強度於本研究架構中具有中介之效果，研究結果發現，道德強度在大部分情況下，對理想主義與道德決策流程具有中介效果。此為本研究之貢獻，此外，現行探討會計之道德領域文獻較為有限，本研究理論架構可供後續研究參考。

近年來，企業營運模式及交易方式日趨複雜，因此，利益至上的商業環境中，專業人士集體構成之舞弊手法已日益增多。Rest (1993) 發現教育和年紀是道德發展中重要的決定因素。因此，學生於大學時期所受之專業教育若能結合道德觀念的訓練甚為重要。本研究結果具有實務重要性，其管理意涵可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教育者可藉此了解影響學生道德決策的因素，在教育上，不僅只是傳授專業知識，職業道德和未來可能面對的道德危機與處理都是教育的一環，雖然個人道德觀念的形成不單只受到學校教育的影響，但學校所教導的道德教育可能可以加以修正與培養，進而慢慢引導學生建立較為正確的價值觀與道德觀。偏向理想主義者會關心他人的福祉，且認為傷害他人是可以避免，也不會選擇導致他人負面結果的壞事。當其遭遇大部分道德困境時，會先判斷其道德強度，產生認知後，依據道德判斷而產生行為意圖。而偏向相對主義者對於道德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他們衡量當時情況多於道德規則。因此在教育課程安排上，可將學生塑造成具理想主義色彩作為努力方向，再輔以辨認客觀道德困境之課程（如商業個案），使學生能於在學期間即對職場上可能遭遇的困境能有所瞭解，在未來職場上遭遇類似困境時，能認知其道德強度，進而形成道德決策。大多數研究顯示女性較男性偏向理想主義（Singhapakdi and Vitell, 1994; McHoskey, 1996），因此可以在男性學生的道德課程設計上做此方面的強化。另財金系學生較會計系及企管系學生偏向相對主義，此研究資訊將可提供從事財務金融相關之教育單位，在安排核心專業課程的同時，亦可考量將道德課程納入，以便透過教育之薰陶提升財務金融人員的道德。另一方面，就企業人力資源之管理而言，學生離開校園進入職場工作後，即成為企業的重要資產，選擇適任的專業人員對企業而言是一項重要課題，在聘用上除了專業知識要求外，具備道德與操守亦是不可或缺的考量。透過本研究可瞭解學生個人道德決策的過程，並從中篩選具備道德之人員，將有助於降低企業未來可能面對道德風險甚至是舞弊的發生。

除第一節緒論外，本文其餘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份為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之建立，爾後說明研究方法與實證結果，最後則為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與假說發展

「道德」(morality)與「倫理」(ethics)雖為兩個不同的名詞，但「ethics」與「morality」在英文中常被交替使用，皆是指對「正確」或「錯誤」行為所作出的判斷，行使符合社會群體所預期的行為(Green, 1994)。本研究主要探討道德哲學、道德強度與個人的道德決策流程之關聯性，因此使用「道德」一詞作為研究所定義之行為判斷的價值準則。但在文章中，因適用性而有時將兩者混用，將視為同一概念。

一、道德決策流程

Rest (1979, 1986) 所提出的個人道德決策行為的四階段模型 (Four-Component Model) 對道德的研究有重要的影響。Rest (1986) 主張，為了決定一個牽涉道德的問題時，個人必須經歷「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道德意圖」及「道德行為」等四個連續的步驟³，個人須先對道德問題產生認知，才會依據個人的道德觀進行是非好壞的評價，並建立企圖作出道德行為的決心，最後才會產生道德行為。此模式將不同的認知結構及流程與道德決策流程結合產生個人道德行為。

Rest (1986) 提到，一個階段的成功並不意謂在任何其他階段也能成功，因為道德決策流程中的每一個階段的概念上是有所區別的。O'Fallon and Butterfield (2005) 整理道德決策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愈能知覺到道德問題，則較能產生道德性的判斷，進而具有較高的道德意圖，最後產生較為符合道德原則的行為 (Robin, Reidenbach, and Forrest, 1996; Singhapakdi et al., 1996; Bass, Barnett, and Brown, 1999; Barnett, 2001; Barnett and Valentine, 2004)。由於實際行為衡量困難，所以排除最後階段。本研究將測試此模型前三個階段的關聯性。綜上所述，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1：「認知道德問題」會影響「道德判斷」，兩者具正相關。

H2：「道德判斷」會影響「道德意圖」，兩者具正相關。

Barnett and Valentine (2004) 發現若愈能認知道德問題，則愈能正向影響其道德意圖，Sweeney and Costello (2009) 亦獲得同樣的實證結果。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3：「認知道德問題」會影響「道德意圖」，兩者具正相關。

二、道德強度對道德決策流程之影響

Jones (1991) 認為 Rest 的模型忽略了事件本身的特性會影響決策過程，因此 Jones (1991) 以 Rest (1986) 的個人道德決策四階段模式為基礎，加入道德強度

³ 本文道德決策中之重要研究變數：「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與「道德意圖」，依照 Rest (1986) 之定義，「認知道德問題」為道德決策者開始認知道德問題(困境)的存在；「道德判斷」為當認知道德問題(困境)存在後，接下來必須決定什麼是正確的決策；「道德意圖」則為作出道德的判斷後，便決定是否依據判斷來行動。

(Moral Intensity) 及組織因素，提出了「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 (An Issue-Contingent Model)」。

Jones (1991) 的議題權變模型最大的特點在於，其首先提出道德困境事件本身對道德決策者的影響。Jones (1991) 認為組織中的個人決策行為是權變的，視道德決策者面對的道德問題 (moral issue) 而定，故以道德問題本身的特性切入，認為道德問題本身的特性會影響個人的道德決策流程，並以「道德強度」代表道德問題本身的特性，其由六個構面所組成—行為後果嚴重性 (Magnitude of consequences)、社會共識 (Social consensus)、結果發生的機率 (Probability of effect)、時間急迫性 (Temporal immediacy)、親近程度 (Proximity)、結果集中程度 (Concentration of effect)。道德強度為一個獨立變數會影響道德決策流程的每個階段。根據過去的實證證據發現，這些道德強度的構面在道德決策流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Nisbett and Ross, 1980; Singhapakdi et al., 1996; May and Pauli, 2002; Barnett and Valentine, 2004; Sweeney and Costello, 2009)。Jones (1991) 提出「道德強度」會影響道德決策過程，也就是說當道德強度越高的道德議題，被認知為道德問題的機會越大，行為後果導致的嚴重性愈大、社會共識愈高、影響的集中度愈高、行為結果造成影響的機率愈大及立即性的影響等，都會突顯道德議題的存在，引起決策者的注意，當決策者認知道德議題存在後，會進行道德判斷或道德推論。

Singhapakdi et al. (1996) 認為可將「道德強度」六個構面進一步簡化為兩項因素，分別命名為「潛在損害」(potential harm) 及「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前者之意涵是當結果嚴重度愈大、結果發生機率愈大、效果集中度愈大或是時間急迫性愈強，則潛在損害程度愈高；後者則意味著若社會共識愈高或與受害者親近程度愈高，則社會壓力愈大。周逸衡等人 (2000) 研究結果顯示，「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兩因素均與道德決策過程中三個階段—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呈現正相關。亦即道德強度高低對於道德決策流程各階段水準之高低，呈現正向的關係與解釋力。故本研究加入「道德強度」此變數，探討學生面對不同道德議題時，是否也會影響其道德決策流程。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4：「道德強度」與「道德決策流程」各階段有關。

H4_a：「道德強度」會影響「認知道德問題」，兩者具正相關。

H4_{a1}：「潛在損害」會影響「認知道德問題」，兩者具正相關。

H4_{a2}：「社會壓力」會影響「認知道德問題」，兩者具正相關。

H4_b：「道德強度」會影響「道德判斷」，兩者具正相關。

H4_{b1}：「潛在損害」會影響「道德判斷」，兩者具正相關。

H4_{b2}：「社會壓力」會影響「道德判斷」，兩者具正相關。

H4_c：「道德強度」會影響「道德意圖」，兩者具正相關。

H4_{c1}：「潛在損害」會影響「道德意圖」，兩者具正相關。

H4_{c2}：「社會壓力」會影響「道德意圖」，兩者具正相關。

三、道德哲學、道德強度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Forsyth (1992)認為道德哲學是指個人的道德信念、態度及價值形成一個整合的概念系統，當面對道德問題時就會依據這些道德哲學的偏好程度產生不同的意圖及行為，所以個人的道德哲學會影響其道德判斷。Schlenker and Forsyth (1977)建議，個體在道德哲學的差異上，區分方法可以更簡化，因此將其分成兩個基本的構面：「理想主義」(Idealism)、「相對主義」(Relativism)。理想主義者相信道德的絕對性，並且使用絕對的道德原則做出道德判斷，認為只要採取“正確”的行為，將可達到理想的滿意結果；且會關心他人福祉，並認為傷害他人是可以避免的，也不會選擇導致他人負面結果的壞事。相對主義者對於道德抱持懷疑的態度，認為道德行為需視情境的本質及其牽涉到的個人，他們衡量當時情況多於道德規則。方妙玲(2008)認為個人會針對倫理議題的客觀事實做主觀的認知感受。也就是說，雖然不同情境的道德強度會影響道德決策，但是每個情境的道德強度仍是由道德決策者所定義與認知；因此有可能同一情境因為不同決策者而產生不同的道德決策。

而過去學者研究(Singhapakdi, Vitell, and Franke, 1999; Dorantes, Hewit, and Goles, 2006; Singh, Vitell, Al-Khatib, and Clark III, 2007)亦發現，個人道德哲學會影響道德強度，理想主義與道德強度正相關，而相對主義則與道德強度呈現負相關，也就是說當個人為高度理想主義時對道德強度的認知愈強，而為高度相對主義時則對道德強度的認知愈弱。由此可知，個人道德哲學影響道德決策時，有部分受道德強度影響。因此，在此理論背景和現有實證研究的基礎下，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5：有較高「理想主義」的個人，對「道德強度」有較高的知覺。

H5_a：有較高「理想主義」的個人，對「潛在損害」有較高的知覺。

H5_b：有較高「理想主義」的個人，對「社會壓力」有較高的知覺。

H6：有較高「相對主義」的個人，對「道德強度」有較低的知覺。

H6_a：有較高「相對主義」的個人，對「潛在損害」有較低的知覺。

H6_b：有較高「相對主義」的個人，對「社會壓力」有較低的知覺。

Douglas et al. (2001)研究指出，個人的道德推理(理想、相對主義)在高道德強度的情境下，會與道德判斷顯著相關，這樣的結果與Jones (1991)的論點相同，也就是當所遭遇之情境，道德強度愈強，個人的道德推理能力愈能辨別，進而產生道德決策。

Singhapakdi et al. (1999) 亦發現，道德哲學會顯著影響知覺道德強度，理想主義與道德強度（親近程度構面除外）顯著相關，而相對主義與道德強度（社會共識、親近程度構面除外）亦顯著相關，且道德強度會中介影響道德哲學和道德判斷與道德意圖。基於上述學者之發現，本研究認為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亦將道德強度設為中介變數，檢測是否中介影響道德哲學及道德決策流程（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進而建立假說如下：

- H7：個人「道德強度」的程度，會中介影響「道德哲學」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 H7_a：個人「潛在損害」的程度，會中介影響「理想主義」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 H7_b：個人「潛在損害」的程度，會中介影響「相對主義」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 H7_c：個人「社會壓力」的程度，會中介影響「理想主義」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 H7_d：個人「社會壓力」的程度，會中介影響「相對主義」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綜合 Rest (1986) 及 Jones (1991) 之道德決策理論模型，探討會計、企管及財金系學生其本身之道德哲學與道德議題本身（道德強度）及道德決策各階段之關聯性（圖 1）。本研究將商業模擬情境應用在道德的研究上，並從不同面向對學生道德決策流程作一整體性探討，但道德行為不在本研究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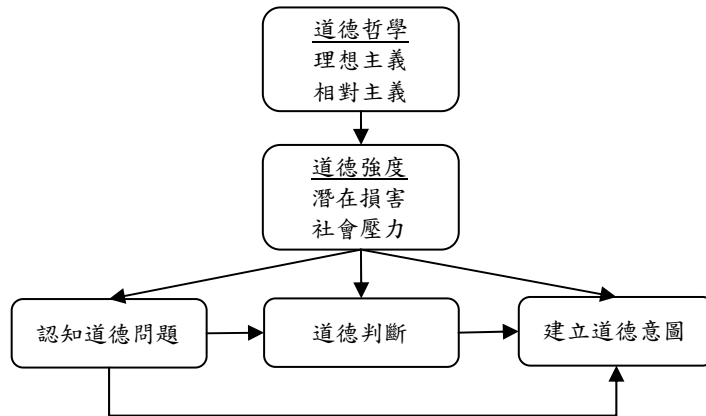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工具

情境 (scenarios) 或故事 (vignettes) 常被使用在道德研究的工具 (Morris and McDonald, 1995)。本研究用來進行調查之問卷情境係採用 Flory, Phillips, Reidenbach,

and Robin (1992) 所設計之四個道德情境，而Leitsch (2004, 2006) 和Sweeney and Costello (2009)之前曾用此情境故事檢測會計系學生的道德決策。每一個情境詳細的描述商場上的道德困境（核准不符規定費用、操縱公司盈餘、資本化與費用化、信用政策），且被認為是在工作場所中具代表性的議題。Flory et al. (1992)指出每一個情境表現出不同類型之道德困境，因此，本研究將分別根據不同類型道德爭議的情境，來探討道德哲學、道德強度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間的關係。為符合我國商業環境，及因為受測對象包括企管、財金系學生，為了不讓會計專業知識造成填答上的負擔，故將情境故事內容加以修改。雖然大部分的學生沒有正式工作經驗，也沒有面對過類似道德壓力及做過相關的決策，但，Rest (1993)發現教育和年紀是道德發展中重要的決定因素，所以可以預期大學教育已經教導他們如何面對工作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其道德推理能力因此形塑而成。每一個道德困境後皆會有一個行為動作回應，確保全部受測者在相同情境下做出判斷（Flory et al., 1992）。

本研究問卷主要由三個部份構成，第一部分：情境分析，本研究採用四種情境模擬為衡量工具，每一個情境有 9 個問題希望受測者回答，包含道德決策流程：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各 1 題、道德強度（共 6 題）。第二部分：道德哲學（理想主義 10 題、相對主義 10 題）。第三部分：人口統計變數。

本研究利用 Singhapakdi et al. (1996) 的問項，分別測量認知道德問題、道德意圖與道德強度，並採用 May and Pauli (2002) 的問項衡量道德判斷。在道德哲學部分，以 Forsyth (1980) 的「道德情況問卷」(EPQ)⁴ 做為本研究衡量的題項。各題項皆採 Likert 七等級量表，從 1-7 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部分題項是以反向計分，並以轉換後分數進行分析。

將初稿⁵交由會計、企管、財金，二、四年學生進行預試問卷填寫，共計回收 60 份有效預試問卷。參考受試者意見，將詞句造成誤解部分加以修改，也針對大部分受測者反映較難理解之「核准不符規定費用」情境、「資本化與費用化」情境刪除，因此修正後之問卷以「操縱公司盈餘」與「信用政策」兩個情境作為測試問項。「操縱公司盈餘」情境，主角（小安），身為公司會計主管，負責財務報表製作，因為上級的壓力而操縱財務報表及公司對會計師建議置之不理等種種作為，已經無形中傷害到公司的長期獲利、利害關係人和企業外部的社會大眾，因此不論在社會觀感或對公司造成之傷害，皆具有重大之影響。「信用政策」情境，強調的是主角所遇到的個人問題，從主角（老趙）的行為來看，其為達到銷售目標而得到紅利獎金，進而放鬆信用

⁴ Forsyth (1980) 認為由於每個人之道德哲學型態存在差異，進而影響個人的道德判斷，他係按兩個構面來代表道德哲學：理想主義與相對主義。同時並於 1980 年發展道德情況問卷 (ethics position questionnaire; EPQ)，此工具經許多研究測試，發現在解釋個人道德判斷 (Forsyth, 1981; Forsyth and Pope, 1984; Forsyth, Nye, and Kelley, 1988; Barnett, Bass, and Brown, 1994; Tansey, Brown, Hyman, and Dawson, 1994) 方面，具有一定之效度。

⁵ 問卷初稿在預試前後，已聘請三位學者專家針對問卷的完整性與翻譯文字合宜性方面提供意見，以避免因翻譯或修訂而失去原意。

額度的賒款方式，雖然公司信用政策並未有明確規定，但對公司本身造成現金可能無法回收之風險，因此社會大眾的輿論壓力或對公司之潛在損害將發揮影響力。

肆、研究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北部三所大學（兩所國立學校、一所私立學校），會計系、企管系及財金系二年級和四年級為問卷調查對象，原則上每系二、四年級均各別發放兩班問卷。問卷發放係於事先聯繫調查對象的授課老師們取得其同意後，於約定時間，直接在其課堂上發放問卷及回收，總計發放 1,500 份問卷，經過整理並刪除無效樣本之後，有效樣本為 1,082 份（國立大學有效問卷 489 份及私立大學 593 份），故有效問卷回收率約為 72.13%。表 1 顯示研究樣本資料，在系別方面，會計學系人數最多，占 38.91%（421 人），其次為企管學系，占 32.62%（353 人），而財金學系人數則占 28.47%（308 人）。在年級分布上，四年級占 51.19%（554 人），二年級占 48.81%（528 人），整體而言，本研究樣本在年級分佈差異不大。性別上，樣本資料顯示，女性為 684 人，占整體之 63.22% 高於男性的 398 人，占整體之 36.78%，本研究樣本顯示女性人數多於男性。

表 1 研究樣本資料

系級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	
會計系	二年級	男	52	4.81
		女	148	13.68
	四年級	男	80	7.39
		女	141	13.03
	合計		421	38.91
	企管系	二年級	男	80
女			103	9.52
四年級		男	72	6.65
		女	98	9.06
合計			353	32.62
財金系		二年級	男	52
	女		93	8.60
	四年級	男	62	5.73
		女	101	9.33
	合計		308	28.47
	總計		1,082	100.00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為確保所使用量表的題目在所屬構面的一致性，以 Cronbach's α 進行信度分析。二種情境之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的三個構念，參考各學者之研究皆為單一問項（周逸衡等，2000；Singhapakdi et al., 1996, 1999; Barnett and Valentine, 2004; Sweeney and Costello, 2009）。經過信度分析後，除情境一「操縱公司盈餘」道德強度之 α 值 (0.691) 稍微低於 0.7 以外，情境二「信用政策」及道德哲學 α 值皆高於 0.7，具有良好的信度及穩定性。因為道德強度各題項皆代表一構面，且情境一道德強度高於 0.6，故將其題項保留。

本研究嘗試在商業的情境下，從道德強度六構面中萃取出相關性較高之因素。Singhapakdi et al. (1996) 研究發現可將「道德強度」六個構面進一步萃取為兩項因素，分別命名為「潛在損害」(potential harm) 及「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相關的研究亦得到相同的結果（周逸衡等，2000；傅豐玲與顏小娟，2002；巫喜瑞與陳皇擘，2007）。

本研究在對道德強度進行因素分析，得到二個情境均可萃取兩個因素，且累積解釋變異量在 61% 以上。本研究所得結果與之前研究相似，道德強度可用二因素來加以衡量。潛在損害為當結果嚴重程度越大、結果發生可能性越大、時間急迫性越高、效果集中度越高，則潛在損害程度越高。社會壓力為社會共識越強與受害者親疏程度越高，則社會壓力越大。所以，本研究為簡化分析，在之後的各項分析中將以此二因素代表道德強度進行後續之統計分析。至於道德哲學部分，參考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1995) 之建議，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 0.5 之題項後，累積解釋變異量 49.7%，因此後續將用此 16 題項做統計分析。

三、道德情境分析

先前研究發現，各情境所隱含不同程度之道德強度會影響道德決策流程，情境中道德強度的程度很可能各自不同，形成了較道德或較不道德之議題 (Leitsch, 2004)。有學者亦提出道德判斷是依賴於所面對情境中道德強度的差異 (Weber, 1990; Barnett, Brown, and Bass, 1994)。Robin et al. (1996) 和 Shafer, Morris, and Ketchand (2001) 推論出議題的道德重要性會影響行為意圖。從上述可以得知，遭遇不同的情境，所隱含的道德強度會有所差異，進而形成不同之道德決策流程。因此本研究將透過下列分析，探討情境間道德強度之差異並對道德決策流程之影響。

根據 Singhapakdi et al. (1996) 的研究，以「認知道德問題」衡量受測者對情境中道德議題的知覺。表 2 顯示二種情境的認知道德問題平均數分別為 5.91 及 5.24，高於中值 4。此表示情境設計確實符合所欲研究之道德議題，同時也顯示研究對象具有道德敏感度，能知覺情境中的道德困境。二情境之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亦高於中值 4。情境一「操縱公司盈餘」，其道德決策流程之三階段平均數 (5.91、5.27、4.51)

皆高於情境二「信用政策」，可知其情境較易使受測者感受得到困境作出道德判斷，進而形成道德意圖。

表 2 道德決策過程平均數表

	情境一 操縱公司盈餘		情境二 信用政策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認知道德問題	5.91	1.22	5.24	1.39
道德判斷	5.27	1.38	4.66	1.35
道德意圖	4.51	1.62	4.14	1.51

巫喜瑞與陳皇擘（2007）指出，模擬情境劇本的設計除了必須具有上述的道德內容特性外，亦必須確認不同情境的道德議題強度是否具有差異，互相比較才有意義。本研究將各情境道德強度六構面之平均數加以比較，表 3 所示，發現不同情境下有不同道德強度的差異。以二個情境道德強度的總平均，為情境一「操縱公司盈餘」4.89 明顯高於情境二「信用政策」4.45，在道德決策流程中也以此情境之平均數最高，與 Flory et al. (1992) 發現相符。情境一是最容易使人感覺不道德的，原因可能為該主角之行為會傷害企業外部的社會大眾，而情境二的行為在當下僅會影響公司內部。因此可以了解當情境的道德強度愈高時，愈會影響決策者之道德決策。

表 3 道德強度平均數表

	情境一 操縱公司盈餘		情境二 信用政策		t 檢定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差異	t 值
潛在損害						
行為後果嚴重性	4.93	1.51	4.46	1.39	0.47	9.33
結果發生的機率	4.99	1.49	4.51	1.35	0.48	9.77
時間急迫性	4.10	1.54	3.86	1.40	0.25	5.42
結果集中程度	5.19	1.49	4.71	1.38	0.48	10.75
社會壓力						
社會共識	5.33	1.45	4.62	1.34	0.71	14.37
親近程度	4.80	1.69	4.56	1.53	0.24	4.71
總平均	4.89	0.95	4.45	0.90	0.44	6.04

從上列分析可以得知本研究所設計情境間有差異之存在，因此於後續研究中，將分別測試及分析個別情境間各構面之差異。

四、假說檢定及研究結果

(一)道德決策流程

心理學領域及社會學上所探討的大部分現象，都是由多重的原因所造成，因此，為了考量到當控制了其他背景變數的影響力之下，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還有多少。因此，本研究將可能會影響道德決策流程之變數做為背景變數—人口統計變數（系別、年級、性別及學校）⁶納入考量。

根據表 4 複迴歸分析得知，道德強度（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於各情境中，皆對道德決策流程產生顯著影響，與 Jones (1991) 提出「道德強度」會影響道德決策流程之觀點相符。在情境一「操縱公司盈餘」與情境二「信用政策」下則呈現顯著正

表 4 道德決策流程之迴歸分析表

自變數	道德判斷		道德意圖		道德意圖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一	情境二
背景變數						
系別—會計	-0.03	0.01	-0.01	0.01	0.00	0.00
系別—財金	-0.06	-0.04	-0.01	-0.06	0.01	-0.05
年級	-0.01	0.03	0.02	0.02	0.02	0.01
性別	0.04	-0.02	0.04	0.03	0.03	0.03
學校	0.03	0.01	-0.06**	-0.05*	-0.06**	-0.05*
道德強度						
潛在損害	0.24***	0.18***	0.43***	0.43***	0.35***	0.38***
社會壓力	0.39***	0.43***	0.15***	0.24***	0.03	0.12***
認知道德問題	0.10***	0.15***	-0.05*	-0.04		
道德判斷					0.31***	0.23***
R ²	0.26	0.34	0.24	0.30	0.31	0.33
調整後 R ²	0.25	0.33	0.24	0.29	0.31	0.33
F 值	46.76***	68.04***	42.64***	56.50***	60.24***	66.58***

1. 截距項非本文關心重點，因此省略未加報導。

2. 「***」表 p < 0.01，「**」表 p < 0.05，「*」表 p < 0.1。

3. 變異數膨脹因素 (VIF) 值均介於 1.006~1.461 間，顯示並未具有重大之共線性問題。

4. 情境一為操縱公司盈餘情境；情境二為信用政策情境。

⁶ 顏信輝與簡穗 (2004) 認為，就影響道德發展之變數而言，主修、年級與工作經驗均可能對會計人士道德態度與信念的調適造成影響，導致道德判斷成熟度可能有所差異。性別一直是常被探討的變數 (如 Ruegger and King, 1992; Shaub, 1994; Giacomino and Akers, 1998 等)。此外，本研究針對北部三所大學 (兩所國立學校、一所私立學校) 的會計系、企管系及財金系學生發放問卷，共發放 1,500 份問卷，因顧及公立學校，可能資源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將系別、年級、性別及學校列為背景變數。虛擬變數設立如下：會計系為 1，財金及企管系為 0；財金系為 1，會計及企管系為 0；四年級為 1，二年級為 0；女生為 1，男生為 0；私立學校為 1，國立學校為 0。

相關，因此 H1 在情境一、情境二下獲得支持。至於道德判斷與道德意圖部分，二個情境皆顯示顯著正相關，故使 H2 成立。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當個人愈能知覺到道德問題時，則較能產生道德判斷，進而具有較高的道德意圖。此與先前研究結果相符（Robin et al., 1996; Singhapakdi et al., 1996; Bass et al., 1999; Barnett, 2001; Barnett and Valentine, 2004）。

而 Barnett and Valentine (2004) 及 Sweeney and Costello (2009) 所提出認知道德問題及道德意圖顯著正相關。本研究中僅情境一達 10% 顯著水準，並為負相關。由此得知，與本研究假說不符，H3 不成立。

(二) 道德強度對道德決策流程之影響

為了考量到當控制了其他背景變數的影響力之下，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還有多少。因此，本研究將人口統計變數（系別、年級、性別及學校）做為背景變數納入考量。根據表 5 中 Panel A 複迴歸分析得知，顯示道德強度的兩個因素—「潛在損害」以及「社會壓力」在情境一、情境二中，均顯著影響學生整體道德決策流程。因此 H4_a、H4_b 與 H4_c 成立。研究結果顯示，當個人面臨道德決策時，其道德問題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強度愈高（或愈低），其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符合道德之程度更為增加（或降低）；此與 Jones (1991) 論點相符。

(三) 道德哲學對道德強度之影響

在道德哲學與道德強度（潛在損害、社會壓力）部分，從表 5 中 Panel B 可以得知，情境一、二，理想主義與潛在損害、社會壓力皆呈顯著正相關。意即當個人為高度理想主義時，對道德強度（潛在損害與社會壓力）的認知則愈強，因此 H5_a 與 H5_b 成立。

相對主義與潛在損害僅於情境二中呈顯著負相關；意即具較高相對主義者對道德強度有較低的認知，只有在情境二「信用政策」中，道德強度之潛在損害構面獲得支持（H6_a），而相對主義與社會壓力僅於情境一「操縱公司盈餘」中呈正向關係且顯著，但與本研究之 H6_b 不相符（負相關）。

Jones (1991) 認為道德強度是對道德議題客觀的描述，並未包括道德決策者本身的特徵；而方妙玲 (2008) 則強調其個體的主觀認知性，認為個人會針對倫理議題的客觀事實做主觀的認知感受。根據 O'Fallon and Butterfield (2005) 的回顧研究，除了性別外，道德哲學是道德決策研究最常被探討的個人因素，可見其重要性。本研究結果發現，偏向理想主義者，對於道德強度二因素（潛在損害、社會壓力）皆顯著正相關，而相對主義者除「操縱公司盈餘」情境外，會與潛在損害呈現顯著負相關，而與社會壓力關係不顯著。本研究認為偏向理想主義者，會優先考量他人福祉，對道德議題的敏感度高，因此能正向顯著影響道德強度。至於相對主義者因為拒絕普遍性的道德規則，認為規範性的信仰會因為文化及個人而有所差異，導致其道德

表 5 道德強度與道德決策流程、道德哲學與道德強度之迴歸分析表

Panel A：道德決策流程						
自變數	情境一			情境二		
	認知道德問題	道德判斷	道德意圖	認知道德問題	道德判斷	道德意圖
背景變數						
系別—會計	-0.02	-0.03	-0.00	0.01	0.01	0.01
系別—財金	0.00	-0.06*	-0.01	-0.03	-0.04	-0.05*
年級	0.05	-0.01	0.02	0.01	0.03	0.01
性別	0.02	0.04	0.03	0.05*	-0.02	0.04
學校	-0.04	0.03	-0.06**	-0.02	0.01	-0.05*
道德決策						
認知道德問題		0.10***	-0.08*		0.15***	-0.08
道德判斷			0.32***			0.25***
道德強度						
潛在損害	0.10***	0.24***	0.36***	0.11***	0.18***	0.39***
社會壓力	0.11***	0.39***	0.03	0.25***	0.43***	0.13***
R^2	0.03	0.26	0.32	0.10	0.34	0.34
調整後 R^2	0.02	0.25	0.31	0.09	0.33	0.33
F 值	4.88***	46.76***	54.93***	16.11***	68.04***	60.55***
Panel B：道德強度						
自變數	情境一		情境二			
	潛在損害	社會壓力	潛在損害	社會壓力		
背景變數						
系別—會計	0.30***	0.10***	0.13***	0.09**		
系別—財金	0.21***	0.10***	0.13***	0.05		
年級	0.12***	0.03	0.06**	0.03		
性別	-0.05*	0.03	0.04	0.06**		
學校	-0.17***	-0.07**	-0.06**	0.02		
道德哲學						
理想主義	0.13***	0.19***	0.11***	0.22***		
相對主義	-0.01	0.05*	-0.07**	-0.02		
R^2	0.13	0.05	0.04	0.06		
調整後 R^2	0.12	0.05	0.04	0.06		
F 值	22.37***	8.34***	6.96***	10.26***		

1. 截距項非本文關心重點，因此省略未加報導。

2. 「***」表 $p < 0.01$ ，「**」表 $p < 0.05$ ，「*」表 $p < 0.1$ 。

3. 變異數膨脹因素 (VIF) 值均介於 1.005~1.507 間，顯示並未具有重大之共線性問題。

4. 情境一為操縱公司盈餘情境；情境二為信用政策情境。

標準會因人或情況而異 (Forsyth, 1980, 1992)，故相對主義者會視情境的本質及其牽涉到的個人加以多方面的考量，道德強度僅為考量因素之一，因此會依情境之各別狀況，僅對潛在損害產生負向影響。也因為衡量當時情況多於道德規則，導致客觀之社會壓力無法對其產生主要之影響，這與過去的研究大致相符 (Singhapakdi et al., 1999; Dorantes et al., 2006; Singh et al., 2007)。

(四)道德強度之中介效果檢測

本研究先運用 Baron and Kenny (1986) 之作法，檢測「道德強度」是否為「道德哲學」與「道德決策流程」間之中介變數。Baron and Kenny (1986) 認為要確定一變數是否為中介變數時，必須進行下列迴歸分析，並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1) 自變數以及中介變數必須個別與依變數有顯著相關。(2) 自變數與中介變數有顯著相關。(3) 當中介變數進入迴歸方程式時，自變數與依變數兩者之相關性減弱或呈現無顯著相關，若自變數對依變數之影響小於自變數單獨預測依變數的迴歸係數 (自變數的迴歸係數 β 值降低)，仍具有顯著性，則為部分中介效果 (Partial mediation)；若呈現無顯著相關 (自變數的迴歸係數 β 值降為 0)，則代表該模型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Full mediation)。

「操縱公司盈餘」情境中，由表 6 中 Panel A 之模式一可得知，自變數—理想主義對依變數—道德決策流程 (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 均呈現顯著相關，而相對主義僅對認知道德問題及道德意圖顯著相關；另依照表 5 中 Panel A 之情境一顯示，中介變數—道德強度 (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 對道德決策流程 (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 均呈現顯著相關，以上符合中介效果成立的 Baron and Kenny (1986) 第一個條件。依據表 5 中 Panel B 之情境一可以看出，自變數—理想主義對中介變數—道德強度 (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 呈顯著正相關⁷，符合第二個條件。依表 6 中 Panel A 之模式二結果顯示，當中介變數—道德強度 (潛在損害、社會壓力) 進入依變數—道德流程 (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 之迴歸方程式後，中介變數—道德強度 (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 依然呈顯著相關，自變數 (道德哲學內之理想主義) 與依變數—道德流程之相關性隨之減弱 (觀察 Panel A 模式一與模式二理想主義 β 值之變化)，亦即理想主義對認知道德問題之 β 值由 0.16 減緩為 0.13，對道德判斷之 β 值則由 0.23 減緩為 0.13，對道德意圖的 β 值則由 0.04 減緩為 0.02，顯示道德哲學中之理想主義對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之影響，道德強度 (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 皆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此符合第三個條件。

「信用政策」情境中，由表 6 中 Panel B 之模式一可得知，自變數—理想主義對依變數—道德決策流程 (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 均呈現顯著相關，

⁷ 情境一中之相對主義則對社會壓力顯著正相關，但是本研究之假說為相對主義與道德強度為負向關係，因此與本研究假設方向不符，故相對主義部分不進一步分析。

表 6 道德哲學對道德決策流程之階層迴歸分析

Panel A：情境一 操縱公司盈餘						
自變數	認知道德問題		道德判斷		道德意圖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背景變數						
系別—會計	0.02	-0.01	0.08**	-0.03	0.10***	-0.00
系別—財金	0.03	0.00	0.04	-0.05	0.09***	0.02
年級	0.06*	0.04	0.03	-0.01	0.06**	0.02
性別	0.01	0.01	0.03	0.03	0.01	0.03
學校	-0.09***	-0.07**	-0.06**	0.00	-0.12***	-0.06*
道德決策						
認知道德問題					-0.05*	-0.07
道德判斷					0.41***	0.31***
道德哲學						
理想主義	0.16***	0.13***	0.23***	0.13***	0.04***	0.02*
相對主義	0.10***	0.10***	-0.02	-0.04	-0.07***	-0.07***
道德強度						
潛在損害		0.09***		0.23***		0.36***
社會壓力		0.08***		0.38***		0.03***
R ²	0.04	0.05	0.06	0.27	0.22	0.32
調整後 R ²	0.04	0.01	0.06	0.21	0.21	0.31
F 值	6.42***	6.82***	10.45	43.67***	33.21***	46.04***
Panel B：情境二 信用政策						
自變數	認知道德問題		道德判斷		道德意圖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背景變數						
系別—會計	0.05	0.01	0.08**	0.01	0.05	0.00
系別—財金	-0.01	-0.03	0.01	-0.04	0.01	-0.05
年級	0.02	0.00	0.06**	0.04	0.03	0.02
性別	0.06**	0.05	0.02	-0.02	0.06**	0.04
學校	-0.03	-0.03	-0.01	-0.01	-0.07**	-0.05*
道德決策						
認知道德問題					-0.03	-0.08
道德判斷					0.42***	0.25***
道德哲學						
理想主義	0.15***	0.09***	0.25***	0.14***	0.01***	-0.01
相對主義	0.04	0.05*	-0.07**	-0.05**	-0.06**	-0.04
道德強度						
潛在損害		0.11***		0.19***		0.38***
社會壓力		0.23***		0.44***		0.13***
R ²	0.03	0.10	0.08	0.34	0.19	0.34
調整後 R ²	0.03	0.07	0.08	0.25	0.18	0.33
F 值	5.09***	13.83***	13.93***	60.16***	28.12***	49.80***

1. 截距項非本文關心重點，因此省略未加報導。

2. 「***」表 $p < 0.01$ ，「**」表 $p < 0.05$ ，「*」表 $p < 0.1$ 。

3. 各迴歸式之變異數膨脹因素 (VIF) 值亦均介於 1.005~1.545 間，顯示並未具有共線性問題。

而相對主義僅對認知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呈顯著負相關；另依照表 5 中 Panel A 之情境二顯示，中介變數—道德強度（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對道德決策流程（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均呈現顯著相關，以上符合中介效果成立的 Baron and Kenny (1986) 第一個條件。依據表 5 中 Panel B 之情境二可以看出，自變數—理想主義對中介變數—道德強度（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成顯著正相關⁸，符合第二個條件。依表 6 中 Panel B 之模式二結果顯示，當中介變數—道德強度（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進入依變數—道德流程（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之迴歸方程式後，中介變數—道德強度（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依然呈顯著相關，自變數（道德哲學內之理想主義）與依變數—道德流程之相關性隨之減弱（觀察 Panel B 模式一與模式二理想主義 β 值之變化），亦即理想主義對認知道德問題之 β 值由 0.15 減緩為 0.09，對道德判斷之 β 值則由 0.25 減緩為 0.14，對道德意圖的 β 值則由 0.01 減緩為 -0.01，顯示道德哲學中之理想主義對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之影響，道德強度（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皆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此符合第三個條件。同樣的，運用 Baron and Kenny (1986) 方法可得出，偏向相對主義者，道德強度之潛在損害僅於「信用政策」情境的道德判斷及意圖，產生中介效果。

綜上可知 H7_a 及 H7_c 在情境一、二下皆成立，H7_b 與 H7_d 則不成立。在「操縱公司盈餘」及「信用政策」情境中，偏向理想主義者之學生面對大部分道德困境時，道德強度（潛在損害及社會壓力）愈會中介影響其道德決策流程（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而當較具相對主義者從事道德判斷及意圖決策時，道德強度的中介效果則不太顯著。總體來說，與 Singhapakdi et al. (1999) 和 Douglas et al. (2001) 所提出之論點大致相符。本研究推論，當學生面對道德情境時，偏向理想主義者相信道德的絕對性，因此會考量客觀情境產生之影響，並採取“正確”的行為，期望達到理想的結果，因此當學生行使道德決策時，透過客觀道德情境形成一個道德決策流程之重要考量。而相對主義者在面對道德問題時，拒絕公式化或依靠一般的道德規則，因此，面對道德議題時，道德強度並非相對主義者之唯一考量，導致其僅於特定情況時產生中介效果。最後，本研究將研究假說的驗證彙整如表 7 所示⁹。

五、額外測試—人口統計變項對道德哲學之差異分析

Singhapakdi et al. (1999) 認為個人道德哲學的根源為道德觀，並整理相關研究後，發現至少有五種個人特性及一個組織因素會對其造成影響：性別、宗教、教育、經驗、薪水及企業倫理的價值觀。因為本研究對象為學生，故針對人口統計變項（如性別、年級及系別）了解其與道德哲學之關係。以道德哲學（理想主義、相對主義）

⁸ 情境二中之相對主義則僅對潛在損失呈顯著負相關，對社會壓力則不顯著。

⁹ 為力求研究之嚴謹性，本研究除了使用複迴歸外，亦用路徑分析法加以驗證，得出相同之結論，基於篇幅之考量，並未附上驗證結果。

為依變數，分別進行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性別、年級及系別進行討論；當變異數分析整體考驗的 *F* 值達到顯著時，則進一步以雪費法 (Scheffe's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

表 7 研究假說驗證結果整理彙總表

研究假說	情境一	情境二
H1 : 「認知道德問題」會影響「道德判斷」，兩者具正相關。	成立	成立
H2 : 「道德判斷」會影響「道德意圖」，兩者具正相關。	成立	成立
H3 : 「認知道德問題」會影響「道德意圖」，兩者具正相關。	不成立	不成立
H4 : 「道德強度」與「道德決策流程」各階段有關。		
H4 _a : 「道德強度」會影響「認知道德問題」，兩者具正相關。	成立	成立
H4 _b : 「道德強度」會影響「道德判斷」，兩者具正相關。	成立	成立
H4 _c : 「道德強度」會影響「道德意圖」，兩者具正相關。	成立	成立
H5 : 有較高理想主義的個人，對道德強度有較高的知覺。		
H5 _a : 有較高理想主義的個人，對潛在損害有較高的知覺。	成立	成立
H5 _b : 有較高理想主義的個人，對社會壓力有較高的知覺。	成立	成立
H6 : 有較高相對主義的個人，對道德強度有較低的知覺。		
H6 _a : 有較高相對主義的個人，對潛在損害有較低的知覺。	不成立	成立
H6 _b : 有較高相對主義的個人，對社會壓力有較低的知覺。	不成立	不成立
H7 : 個人道德強度的程度，會中介影響道德哲學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H7 _a : 個人潛在損害的程度，會中介影響理想主義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成立	成立
H7 _b : 個人潛在損害的程度，會中介影響相對主義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不成立	不成立
H7 _c : 個人社會壓力的程度，會中介影響理想主義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成立	成立
H7 _d : 個人社會壓力的程度，會中介影響相對主義與道德決策流程之關係。	不成立	不成立

理想主義方面，依表 8 研究結果顯示，以系別 (會計、企管及財金系) 分組檢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各系之學生在理想主義上並無顯著差異。若以年級和性別各自進行 *t* 檢定分析，無法發現年級有顯著差異，性別則與理想主義具有顯著差異，女性平均數高於男性 ($5.38 > 5.24$)。至於相對主義方面，依表 9 研究結果顯示，以系別 (會計、企管及財金系)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系別間之差異是顯著的，因而進一步執行 Scheffe 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財金系學生之相對主義程度顯著高於會計及企管系學生。若以年級和性別各自進行分析，發現並無顯著差異。綜合上述分析，可以得知，性別在理想主義上具有顯著之差異，女性較男性偏向理想主義，結果與過去研究相符 (Singhapakdi and Vitell, 1994; McHoskey, 1996)。至於年級不論在理想或是相對主義上沒有顯著差異，相較於會計及企管系學生，財金系學生之道德哲學較偏向相對主義。

表 8 「理想主義」上之差異分析表

人口變項	類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系別	會計	421	5.39	0.89	1.93	0.15
	企管	353	5.32	0.86		
	財金	308	5.26	0.97		
年級	二年級	519	5.31	0.82	-0.68	0.5
	四年級	563	5.35	0.98		
性別	男	379	5.24	1.03	-2.31	0.02**
	女	703	5.38	0.83		

註：「***」表 $p < 0.01$ ，「**」表 $p < 0.05$ ，「*」表 $p < 0.1$ 。

表 9 「相對主義」上之差異分析表

人口變項	類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多重比較
系別	會計	421	5.16	0.86	5.02	0.01***	財金 > 會計 財金 > 企管
	企管	353	5.21	0.83			
	財金	308	5.35	0.85			
年級	二年級	519	5.19	0.83	-1.62	0.11	
	四年級	563	5.27	0.87			
性別	男	379	5.24	0.95	0.43	0.67	
	女	703	5.22	0.79			

註：「***」表 $p < 0.01$ ，「**」表 $p < 0.05$ ，「*」表 $p < 0.1$ 。

本研究為了解變數間是否具交互作用，進一步個別針對理想主義及相對主義執行 3 (系別：會計、企管與財金) × 2 (年級：二與四年級) × 2 (性別：男與女) 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¹⁰。理想主義部分，實證結果指出不同系別 (會計、企管及財金) 同學間理想主義之差異，於大二及大四階段是不相同的。雖然個別測試系別與年級均無顯著差異，但經過其交互影響後，有可能專業教育會造成三個科系的學生之理想主義有不同的變化。至於相對主義部分，不同系別會有所差異，同時不同系別學生間之相對主義，會因為性別之差異而有所不同，故或可推論不同系別學生可能會因為接受不同專業教育而導致其相對主義有所差異，但是同一科系中之學生其性別差異亦可能造成相對主義有不同的變化。上述額外測試之發現，後續研究可再做深入之探討。

¹⁰ 基於篇幅之考量，此處未列示三因子變異分析表。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學生個人道德哲學、道德強度及道德決策流程之關聯性，並運用 Baron and Kenny (1986) 之作法及路徑分析，檢測道德強度是否為中介變數，最後利用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系別、年級和性別在道德哲學方面是否有所差異。

首先，關於道德決策流程方面，本研究根據「操縱公司盈餘」及「信用政策」二個情境實證結果顯示，當學生愈能知覺到道德問題時，則較能產生道德判斷，進而使其行為意圖傾向符合道德標準的程度則愈高。其次，本研究發現道德強度（潛在損害與社會壓力）與道德決策流程具有正相關，意即當學生面臨道德決策時，其道德問題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強度愈高（或愈低），其認知道德問題、道德判斷及道德意圖，符合道德之程度更為增加（或降低）。至於道德哲學對道德強度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偏向理想主義者，對於道德強度的認知則愈強，惟具較高相對主義者對道德強度有較低的認知之論點，整體而言，在本研究中並未獲得證實。再就道德強度之中介效果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偏向理想主義之學生面對道德困境時，其道德強度愈會中介影響其道德決策流程。而偏向相對主義者行使道德決策時，道德強度之中介影響則較不顯著，僅於特定情境中產生中介效果。最後檢測學生之道德哲學是否會因系別、年級和性別而有所差異。實證結果顯示，相對主義會因系別之不同有所差異。財金系學生其相對主義色彩顯著高於其他兩系之學生（會計、企管）；至於年級不論在理想或是相對主義上沒有顯著差異；而性別在理想主義上具有顯著之差異，女性較男性偏向理想主義。

本研究有以下幾點限制。首先，本研究為防止受測對象與母體間具有差異，故以二所國立大學及一所私立大學作為研究發卷單位，但仍有可能為特定學校教學環境之特性所造成，無法類推至整體教育現象；其次，道德強度及道德決策流程問項道德強度採用 Singhapakdi et al. (1996, 1999) 所發展之道德強度量表，道德決策流程亦採用 Singhapakdi et al. (1996) 及 May and Pauli (2002) 發展之量表，雖經實證研究具有良好信、效度，但因道德強度六構面及道德決策流程各階段均為單一問項，無法針對每構面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因而造成本研究之限制；接著，道德研究可能會出現「社會期望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現象 (Randall and Fernandes, 1991)。雖然於問卷設計及發放填寫時，以用不記名及不說明題意等方式，避免此偏誤，但仍可能於填寫道德問卷時，為了迎合社會大眾所能接受之行為，而選擇更好的答案，因此有可能產生社會期望偏誤；最後，道德情境非親身經歷，關於資料蒐集方法係採用虛擬情節並提供結構性答案讓受訪者選擇，據其提供的答案衡量受訪者的決策行為，缺點包含受訪者是以「想像」來提供答案，若是個人親身經歷則答案或許不同，以及受訪者對問卷提供的答案之外可能有其他想法，因此若能再加入非結構式的訪談是更為理想。

至於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首先，針對道德發展之影響變數而言，本研究係採橫斷面（cross sectional）之比較作分析，而非針對同一群受試者作長期性（longitudinal）之追蹤分析，故對受試者道德發展歷程未能完整探討，後續研究亦可採用長期性之方式，以期對教育與工作環境之影響道德發展程度有更深入之探討。其次，本研究之結果有可能為特定學校教學環境之特性所造成，所以未來研究可從不同學校之角度切入探討不同教育環境是否影響該校學生之道德觀。第三，Rest (1993) 發現教育和年紀是道德發展中重要的決定因素。本研究從教育之角度探討其道德決策流程，後續之研究可從年紀或工作經驗之面向進行探討。第四，本研究對人口變項進一步探討交互影響後，發現當學生經過各別科系之專業教育訓練後其理想主義會因年級而呈現不同之變化。而相對主義會因為不同系別產生差異，但各系學生也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呈現相對主義之差別。以上可於後續研究中做深入之探討。最後，至於認知道德問題與道德意圖之關聯性，Barnett and Valentine (2004) 及 Sweeney and Costello (2009) 係提出認知道德問題及道德意圖顯著正相關之發現，然而本研究之檢測結果卻為顯著負相關，與前述學者不符，後續研究可做進一步深入之探討。

參考文獻

- 方妙玲，2008，道德成熟度、道德強度以及組織倫理氣候對員工個人倫理決策意向的影響之研究，*中原企管評論*，第6卷第1期：127-152。
- 巫喜瑞與陳皇擘，2007，網路交易消費者道德決策研究—道德強度、道德哲學與匿名性之影響，*管理學報*，第24卷第5期：531-550。
- 周逸衡、凌儀玲與巫喜瑞，2000，道德哲學與道德強度對行銷道德決策過程之影響，*亞太管理評論*，第5卷第4期：467-485。
- 傅豐玲與顏小娟，2002，資訊服務廠商行銷道德決策過程研究，*資管評論*，第11期：1-26。
- 顏信輝與簡穗，2004，我國會計人員道德發展之探討：科系、年級、性別與事務所工作經驗之影響，*會計評論*，第38期：1-29。
- Barnett, T. 2001. Dimensions of moral intensity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1 (5): 1038-1057.
- Barnett, T., G. Brown, and K. Bass. 1994. The ethical judgments of college students regarding business issue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69 (6): 333-338.
- Barnett, T., and S. Valentine. 2004. Issue contingencies and marketers' recognition of ethical issues, ethical judgment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7 (4): 338-346.
- Barnett, T., K. Bass, and G. Brown. 1994. Ethical ideology and ethical judgment regarding ethical issues in busines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 (6): 469-480.
- Baron, R. M., and D. A. Kenny.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6): 1173-1182.
- Bass, K., T. Barnett, and G. Brown. 1999. 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s, ethical judgments, and ethic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9 (2): 183-205.
- Dorantes, C. A., B. Hewitt, and T. Goles. 2006. Ethical decision-making in an IT context: The roles of personal moral philosophies and moral intensity. *Proceedings of the 39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HICSS06*, 8 (C): 206c-206c.
- Douglas, P., R. Davidson, and B. Schwartz. 2001.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ethical orientation on accountants' ethical judgm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4 (2): 101-121.
- Fishbein, M., and I. Ajzen. 197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Flory, S. M., T. J. Phillips, R. E. Reidenbach, and D. P. Robin. 1992.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selected ethical issues in accoun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67 (2): 284-302.
- Forsyth, D. R. 1980. A taxonomy of ethical ideolog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 (1): 175-184.
- Forsyth, D. R. 1981. Moral judgment: The influence of ethical ide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7 (2): 218-223.
- Forsyth, D. R. 1992. Judging the morality of business practices: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moral philosophi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 (5-6): 461-470.
- Forsyth, D. R., and W. R. Pope. 1984. Ethical ideology and judgments of social psychology research: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6): 1365-1375.
- Forsyth, D. R., J. L. Nye, and K. Kelley. 1988. Idealism, relativism, and the ethic of caring.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2 (3): 243-248.
- Giacomino, D. E., and M. D. Akers. 1998. An examin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rsonal value and value types of female and male accounting and nonaccounting majors.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13 (3): 565-584.
- Green, R. M. 1994. *The Ethical Manager: A New Method for Business Ethic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Macmillan.
- Hair, J. F., R. E. Anderson, R. L. Tatham, and W. C. Black. 1995.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With Reading*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 Jones, J., D. W. Massey, and L. Thorne. 2003. Auditors' ethical reasoning: Insights from past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Literature* 22: 45-103.
- Jones, T. M. 1991.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 An issue contingent model.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 (2): 366-395.
- Leitsch, D. L. 2004.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s of moral intensity in the moral decision proces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ud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53 (3): 313-323.
- Leitsch, D. L. 2006. Using dimensions of moral intensity to predict ethical decision-making in accounting. *Accounting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5 (2): 135-149.
- May, D. R., and K. P. Pauli. 2002. The role of moral intensity in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 review and investigation of moral recognition, evaluation, and intention. *Business and Society* 41 (1): 84-117.
- McHoskey, J. W. 1996. Authoritarianism and ethical ideology. *Journal of Social*

- Psychology* 136 (6): 709-717.
- Morris, S., and R. A. McDonald. 1995. The role of moral intensity in moral judgmen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4 (9): 715-726.
- Nisbett, R., and L. Ross. 1980. *Human Inference: 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O'Fallon, M. J., and K. D. Butterfield. 2005.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thical decision-making literature: 1996-2003.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59 (4): 375-413.
- Randall, D., and M. Fernandes. 1991. The 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 in ethics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0 (11): 805-817.
- Rest, J. R. 1979. *Development in Judging Moral Issu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est, J. R. 1986. *Moral Development: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Praeger.
- Rest, J. R. 1993. Research on Moral Judgment in College Students. In Andrew Garrod (ed.), *Approaches to Moral Development: New Research and Emerging Themes*, 201-213.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Robin, D. P., R. E. Reidenbach, and P. J. Forrest. 1996.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an ethical issue as an influence on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of advertising manager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35 (1): 17-28.
- Ruegger, D., and E. W. King. 1992.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age and gender upon student business ethic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 (3): 179-186.
- Schlenker, B. R., and D. R. Forsyth. 1977. On the ethic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3 (4): 369-396.
- Shafer, W. E., R. E. Morris, and A. A. Ketchand. 2001. Effects of personal values on auditors' ethical decisions.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14 (3): 254-277.
- Shaub, M. K. 1994. An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demographic variables with the moral reasoning of auditing students and audito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12 (1): 1-26.
- Singh, J. J., S. J. Vitell, J. Al-Khatib, and I. Clark III. 2007. The role of moral intensity and personal moral philosophies in the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of marketer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15 (2): 86-112.
- Singhapakdi, A., and S. J. Vitell. 1994. Ethical ideologies of future marketers: The relative influences of machiavellianism and gender. *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 16 (1): 34-42.

- Singhapakdi, A., S. J. Vitell, and G. R. Franke. 1999.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medi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moral intensity and personal moral philosophie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7 (1): 19-36.
- Singhapakdi, A., S. J. Vitell, and K. L. Kraft. 1996. Moral intensity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of marketing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36 (3): 245-255.
- Sweeney, B., and F. Costello. 2009. Moral intensity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undergraduate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students. *Accounting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8 (1): 75-97.
- Tansey, R., G. Brown, M. Hyman, and L. E. Dawson. 1994. Personal moral philosophies and the moral judgment of salespeople. *The 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 and Sales Management* 14 (1): 59-75.
- Weber, J. 1990. Managers' moral reasoning: Assessing their responses to three moral dilemmas. *Human Relations* 43 (7): 687-702.
- Wright, G. B., C. P. Cullinan, and D. M. Bline. 199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s value and perceptions of moral intensity: An empirical study.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9: 26-40.

附錄 研究問卷

第一部分

情境一、操縱公司盈餘：

小安是公司的會計主管，財務長明示“必須在年底達到特定盈餘預測及營運資金的目標”。但是，目前收入已經遠低於當初的預期，小安實在不知道如何達到目標。財務長建議她操縱財務報表，另外，會計師對公司提出的建議，財務長也置之不理。

小安告訴她的丈夫（其他公司的高階主管），“在良心上，我不該如此做，但另一方面，我也應該對公司絕對的忠誠”。她丈夫說，大部分的公司其實都在做這類的事情，而且當公司的營收狀況變好時，便可以將此事掩蓋住；並且提醒她因為目前的薪水才能維持現在的生活品質，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使她丟掉工作。

行為：小安決定同意她上司提出的建議—操縱財務報表。

請於下列題項，圈選你同意的程度，藉此來評價小安的行動。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數字越靠近 1 表示越不同意，數字越靠近 7 表示越同意。

我認為：

- 1.上述的情境，小安牽涉到道德價值的判斷。
- 2.小安不應該採取上述的行為。
- 3.小安的行為，對公司所有相關人員造成的傷害將是微小的。
- 4.大多數的人會覺得小安的行為是不對的。
- 5.小安的行為實際上會引起傷害的機率很小。
- 6.小安的行為在短期內不會造成對其他人任何損害。
- 7.如果財務長私底下是小安的好朋友，則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 8.如果真的有傷害的話，小安的行為只會傷害少數人。
- 9.如果我是小安，我會做一樣的決定。

情境二、信用政策：

老趙是一間公司的會計部門的副主管，他個人有沉重的家庭經濟壓力。部門主管目前休假中，所以部門內的事情都是由他決定。

老趙接到一通老朋友的電話，要求老趙將設備賣給其新公司，並給予較多的信用賒款。老趙很同情他，但是也知道增加信用額度給新公司可能會帶來風險，特別是公司對這類交易，通常會要求嚴格的信用控制。當小陳經理知道此事時，非常有興趣，並且提到促成這筆交易才能達到當季預期銷售目標，而且管理階層還可以獲得紅利獎金（包括老趙在內）。

行為：老趙決定銷售設備給老朋友的新公司。

請在下面的句子中，圈選你同意的程度，藉此來評價老趙的行動。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數字越靠近 1 表示越不同意，數字越靠近 7 表示越同意。

我認為：

- 1.上述的情境，老趙牽涉到道德價值的判斷。
- 2.老趙不應該採取上述的行為。
- 3.老趙的行為，對公司所有相關人員造成的傷害將是微小的。
- 4.大多數的人會覺得老趙的行為是不對的。
- 5.老趙的行為實際上會引起傷害的機率很小。
- 6.老趙的行為在短期內不會造成對其他人任何損害。
- 7.如果老朋友私底下是老趙的好朋友，則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 8.如果真的有傷害的話，老趙的行為只會傷害少數人。
- 9.如果我是老趙，我會做一樣的決定。

第二部分

下列各題描述人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及態度，請就個人的觀點，依據您對各項敘述的同意程度，圈選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數字越靠近1表示越不同意，數字越靠近7表示越同意。

1. 每個人都該確認他們不會有故意傷害別人的行為，即使是小小的傷害。
2. 不論風險多小，我也絕對不讓別人為我冒風險。
3. 不論為了何種利益，若有傷害別人的可能，這行為就是錯的。
4. 每個人都不該對他人造成心理或生理上的傷害。
5. 每個人不應該做出可能傷害別人尊嚴或福利的行為。
6. 一個人不應該做出可能傷害到無辜第三者的事情。
7. 先衡量行為的結果是正面或負面再決定是否做該件事，乃是不道德的。
8. 每一個社會中，應該要最重視人的尊嚴和福利。
9. 在任何情況下，絕對不需要去犧牲他人的福利。
10. 道德的行為就是符合「完美行為」的典範。
11. 沒有任何道德原則，重要到必須列入行為準則中。
12. 所謂的道德，會因不同的情境和社會背景而有所轉變。
13. 道德標準是相當主觀的；一個人認為是道德的事情，另一個人可能會認為不道德。
14. 不同的道德標準之間，沒有所謂的「對」或「錯」。
15. 對於道德或不道德的看法會因人而異。
16. 道德標準只是個人的行為準則，因此不能用自己的道德標準來評判他人的行為。
17. 在人際關係中的道德考量太複雜，所以應該容許每個人建立自己的道德標準。
18. 為了阻止某些行為的發生而設立的嚴格道德規範，會妨礙較佳的人際關係。
19. 說謊是被允許或不被允許，是依情況而定。
20. 判斷一項說謊是道德或不道德，須依當時情況而定。